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Volume 1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6-1994

80年代台灣政治文化與台灣散文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Prose of Taiwan in the 80's

Xue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rmlc_1

Recommended Citation

徐學 (1994)。80年代台灣政治文化與台灣散文。《現代中文文學評論》，1，1-10。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rmlc_1/2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Volume 1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80年代台灣政治文化與台灣散文

徐 學

I

80年代以來，台灣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解嚴，解禁，兩岸交流的日益頻繁，促使台灣政治文化不斷更新。

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成員，作家也生活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環境中，他們在這種環境中學習，領略或者繼承着代表一定政治生活方式的政治信念，接受政治共同體或者特定政治集團、政治階層的觀念。從家庭到學校、社會，他們也和其他人一樣，逐步形成自己的政治個性，塑造自己的政治人格。因此，當代作家，依然如千年之前亞里士多德所判定的那樣，也是個政治人。即使並不熱衷於“政策文學”和“黨派文學”，不願“媚政”亦不願“訐政”，他們在創作中，也總會或多或少表露出某種政治情緒、政治感情或政治情結——或者宣泄自我對某一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的感受和思索；或者表達個人對合理社會體制的理想；或者抒發高壓政治下的鬱悶與忿懣……在當今中國，尤其是80年代的台灣，作家更處於一個政治參與意識極為廣泛，政治形態加速變遷的時空，他們善感多思的心靈不能不對這種政治環境作出回應。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80年代台灣文學既受到當代台灣政治文化的制約和牽引，同時也構成台灣政治文化的一個側影。全面探究與釐清台灣文學與台灣政治文化的互動關係，並非本文的目的。筆者在此所要做的，僅是嘗試着對80年代台灣散文創作中與台灣政治文化關係密切的部分，作一粗線條的勾勒與描述，並願就幾個比較引人注目的問題提供一己之見，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討論或辯難。

II

當代台灣政治文化的一個最顯著特點，就是政治多元化。放眼當今台灣，從學生到勞工，從婦女到原住民，往昔社會最安分守己的一羣，如今都不斷走向街頭，爭取他們的權益，“愛拼才會贏”的求變聲音，代替了哀怨苦楚的“心事誰人知”。

政治多元化帶來了較為寬鬆自在的創作心態，政治禁錮與禁忌已不再成為散文家創作時揮之不去的陰影，散文家有了空前廣闊的思維空間，表現作家政治認知與政治情懷的散文品類遠較80年代之前更為豐富多姿。

80年代以來，與台灣作家政治心態政治認知緊密相關的散文品類大略可以分為以下四種：

一、以近百年來中國政治為大背景，描繪台灣歷史與現實中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及人們對此的感受，這些作品大都具有較強烈的寫實色彩。

二、對台灣政治生態乃至整個中國政治生態的嘲諷與質疑，此類散文大都具有寓言品格，指涉意義較為婉轉內斂，擁有較多的歧義空間。

三、生態環保散文。

四、具有較濃厚的台灣本土意識，以台灣鄉野經驗為主要內容的鄉土散文。

這裏要附帶指出的是，在將各家作品歸類論說時，難免淡化了各個作品的個性及難以融合的特色，或許，這正是從政治看文學此一論題的無奈。

以近代中國政治為大背景，反映台灣及海外中國人的政治心態的散文，在80年代之前的台灣文壇，已形成一股強勁的潮流。夏志清教授曾用“感時憂國”來概括中國現代小說中的一種主導性情感，此四字亦可用來說明本文所說的此類散文中的政治情懷。至少從60年代以來，台灣的優秀散文作品就時常滿帶着一種飽經憂患的感喟和割捨不下的文化鄉愁，這方面傑出的代表有余光中、王鼎鈞、司馬中原、張曉風、張拓蕪，幾乎包括了在台灣的大多數優秀的前行代散文家。

我們當然不願將這些各具風彩的散文一律冠之以政治散文的名目，但我們也不能不指出，這些散文是激烈動蕩百年憂患的政治環境下的情感產物。其中的憂患與鄉愁，無論是對故土血脈的尋覓（如王鼎鈞對家鄉蘭陵），或是對民族既往輝煌文化的緬懷（如余光中與張曉風），還是對漂泊離亂的追憶（如張拓蕪的士兵生涯），都表現出創作者高揚的使命感，他們深淺不同地思索着人們在政治動蕩、國

土分裂中的痛苦，探索着民族苦難的根源，渴望漢文化的弘揚和中國的强大。這種政治情懷為大多數台灣散文家所有，即使在提倡寫永恒人性以寫閒情小品著稱的梁實秋散文集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如〈平山堂記〉、〈記張自忠將軍〉這樣滿懷憂國憂民之情的作品。^①進入80年代，此類散文依然高潮迭出，《龍坡雜文》與《左心房漩渦》再次震撼文壇。^②前一書極寫憂樂歌哭之事，死生契闊之情充盈其間，蕭疏澹墨中見悲涼之境，被評為“思極深而不晦，情極哀而不傷，所記文人學者事，皆關時代運會。”^③後者以悲天憫人的寧靜篤定，民族情懷的堅毅闊大超越了小我的酸楚與哀怨，氣勢浩蕩地寫出背井離鄉中國人心房中的漩渦。開放探親之後，大量寫探親感受的散文又把鄉愁與憂患重新品味；還有一批年輕的作家，如朱天心、張大春、袁瓊瓊，寫下了他們眷村成長的哀樂經驗。^④

在台灣政治文化日趨多元化的推動下，這一類散文也出現了新的特點，它顯得更加無所顧忌，並且敢於涉及一些歷來視為政治禁區的敏感題材。最突出的是龍應台，她的雜文既揭露台灣民衆與台灣社會中的各種陋習，也大膽直斥當局，特別指出他們沒有勇氣“面對自己暴力的歷史”，如二·二八事件、雷震事件、孫立人事件……^⑤楊牧在其《山風海雨》與《方向歸零》兩本散文集中，也大膽呈露了自己的政治態度，透過幼時至少年的自我心理成長過程，隱隱再現了太平洋戰爭到50年代台灣社會中的畸形政治——“是一個摻和了憤怒和恐懼的，一個因為嚴厲、肅殺、猜忌到了某種程度遂化為沉默的、相當空洞的時代。”^⑥

第二類散文多出自新生代作家之手，主要的代表作有林耀德的《一座都市的身世》、《迷宮零件》，黃凡的《黃凡的頻道》、《黃凡專欄》、《東區連環泡》及林彧的一系列寓言散文。這些散文的主要焦點雖則不在政治而在都市，可台灣都市既是社會變遷的縮影，現代文明的碑林，也是政治的集中表現和文化霸權的象徵。因此，在上述這些作品中，也免不了對都市政治景觀的思索與質疑——黃凡通過對各類政治人物的嘲諷表現了他的政治潔癖；林彧的寓言，將政治的專斷也納入都市人的生存困境中一併加以控訴和譏刺；^⑦林耀德常常用一些饒富意味的意象來表達自己對政治的嘲笑和質疑，如將民主與獨裁之間的距離比作 HOTEL 與臥房的差異；^⑧（HOTEL 和家中臥室的區別在於其開放性民主性總是和婚姻機械堆砌出來專斷相頡頏）又如在一張地圖上尋找關於中國的不同概念。^⑨由於他們獨造的意象和寓言，使之指涉的層面不僅局限於台灣一隅，它超越了某些社會表象，而直探人類永

恒的政治難題。

第三類是生態環保散文。將這類散文與政治文化聯繫在一起來考察是出於以下這樣一種考慮，在現代國家中，鎮壓性的職能已經逐步讓位於公共職能，也就是說，在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指導、管理、協調、服務的政治功能將逐漸取代控制、戒嚴、威懾、監視的政治功能。只有當國家具有良好的公共職能，才能使自然資源和各種生命支持系統永不枯竭，使社會智力系統和生產系統長盛不衰，使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系統均衡生長。就此而言，為生態環保問題大聲疾呼的散文，正是對台灣社會政治公共職能執行情況所發表的一種政見書。在這方面用力最勤者為劉克襄、陳煌、心岱、洪素麗等，特別是劉克襄，他以科學家式的嚴謹與熱誠，描寫了台灣海岸線上的地理面貌、生態景觀、水文氣候及各類水鳥的生活習性，以此提醒人們與鳥類和平相處，與大自然共存共榮。他的散文大都是冷靜觀察和客觀記錄，但有時也忍不住直抒胸臆，痛斥時弊：“現行體制所制定的自然保育方案面對它時下的社會結構，往往脆弱不堪，毫無具體落實的保護網，除非體制的基礎有所整治改革，我將一直懷疑下去。”^⑩這便是生態散文家的政治宣言。

如果將以維護台灣文化生態良性發展為主旨的散文也歸入生態散文，那麼在此類散文作家的行列中，至少還要加上重視青少年教育問題的苦苓和不辭辛勞在台灣鄉村採風的劉還月。

III

鄉土散文的興起與台灣政治文化中的本土化潮流高漲是息息相通的，它也可以說是一種長期鬱結的“台灣意識”的宣泄渠道。在二·二八事件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文學創作中直接涉及台灣歷史或本土文化的作品，都可能被扣上“地域主義”或“分離主義”的帽子。70年代“鄉土文學論爭”之後，本土意識在文學中爭得了一席之地。伴隨着政治上台灣化本土化的腳步，關懷台灣，擁抱土地的創作觀念更加深入普及於作家羣中。有許多散文家開始認識到，他們固然是“龍的傳人”，但首先是他祖父他父親的傳人；他們是五千年文化的繼承者，但更直接地是在近代台灣文化中孕育成長的，所以，他們的筆墨不能從本鄉本土中逃逸而去，美麗島的風土人情應該是他們創作最直接的源泉。

80年代以台灣經驗為題材的散文遠遠超過此前任何一個年代。台灣經驗可以包括都市經驗與鄉土經驗兩方面的內容，但因為鄉土經驗的創作具有更濃厚的本土色彩，與台灣政治文化的變動有更為密切的聯繫，因此這裏着重分析後一類散文。

以自己的鄉野成長背景為描寫重心或光圈焦點，表達自己與這塊土地血脈相通的情感和經驗，特別為台灣省籍散文家所喜好。這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家至少有吳晟、季季、阿盛、丘秀芷、林文義、白辛、陳冠學、陳列等人。

吳晟在《農婦》與《店仔頭》兩部散文集中，描寫了當代台灣農家許多瑣碎鄙俗之事，表現出現代文明巨獸驅逐了農村中的地主和貧困之後，又帶來了一系列新的危機——喜宴上的脫衣舞。小販用擴音機叫賣的嘈雜聲。鄰人在天旱時為搶水而爭鬥……各種怪誕反常的鏡頭顯示出千百年形成的宗法社會已土崩瓦解。在作者不作態也不表態近乎自然主義的灰暗圖景中，尚有一個光圈，就是堅忍地執着於既往村社農婦生活方式的母親，實際上，在吳晟的散文中，母親這個形象已經是作為一種與都市文化相抗衡，一種田園模式的生命形態被崇拜着。^① 這種生命形態同樣見諸於簡媜的〈漁父〉、詹西玉〈金帛獻千家〉的母親和蕭蕭的〈父王〉，^② 在這裏，家園意識血親情感似乎已被引向了更深層的生命意識。

以其多本散文集為當代台灣散文拓出了一塊新領地的是阿盛。他寫新營，寫艋舺（萬華），寫鳳凰樹，寫西北雨，寫“火車與稻田”，寫“十殿閻君”，寫“春秋麻黃”，寫“石頭羅漢”……他用平實憨厚的語調，說着既土且鮮的鄉民經驗，把台灣的奮鬥、台灣的變遷、台灣的墮落與台灣的繁榮都寫進去了。他的關切點在這個島上，那種無根或失根的情緒在他的散文中是找不到的。他緊擁着自己的故鄉，縱然這是一塊傷痕纍纍的土地。阿盛可貴之處還在於他深厚而不狹隘，他能不斷調整自己，不膠着於某一點，在《綠袖紅塵》中我們看到了他的台北經驗，這一突破顯示了他的潛力。^③

在許多優秀的鄉土散文中，我們讀到了台灣，也讀到了中國，他們的創作勝似雄辯地說明了，鮮活的“台灣鄉野文化”正是“中華文化”的本土形式，而“中華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正是“台灣鄉野文化”的精神源頭。鄉土散文的實績也證明了文學創作中的台灣經驗和台灣意識，正確加以處理，不但不會背離中國文學的大傳統，而且能夠豐富和增益這一傳統，正如把閩南口語和句式恰到好處地融入散文創作中，能夠豐富漢語詞匯，增強它的表現力一般。

當具有獨派思想的作秀者，正不斷挑起“台灣情結”來作為台灣社會躁動的一個情緒焦點時，一些文學家以他們的作品說明了台灣文化裏的中國共性與中國文化中的台灣個性，說明了民族與鄉土是如何可以相得益彰。這些作品的文學價值與政治意義，在多年後那些“訐政文學”已被人遺忘之後，將更見光彩。

IV

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許多優秀的台灣作家在散文創作上都有意與政治現實保持一定距離，從梁實秋、吳魯芹一直到新生代散文家，都或顯或隱地帶有這種傾向。但是，文學家對人文政治的期望，或者文學家的政治理想，即使不從大前提長驅直入，也會於細微處迂迴轉進。國土分離引起的民族危機感，文化斷裂帶來的歷史岔道感，總在敏感多思散文家的心靈中揮之不去。消除對峙，擺脫貧困，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統一和繁榮的中國，是絕大多數台灣地區中國作家的政治理想，只不過對於這種理想的美學傳達方法各有不同。大體而言，前行代散文家多以感時憂國的心理歷程加以烘托，新生代散文涉筆於此時則有意凸顯其冷靜客觀的寓言品格，前者沉鬱動人，後者奇突詭譎。這種差異作為一種文學現象，至少說明了政治文化與文學創作的關係並非簡單的對應，或者說，政治現實的發展變動並非總是立竿見影地在文學羣體的創作心理上被完整地投射出來，在此有必要略加討論。

就手頭有限的資料，我想以兩篇同題散文略加比較來嘗試着說明這一差異，它們是余光中和林耀德先後發表的〈地圖〉。

余光中的〈地圖〉寫於1967年，那時，他經過了多年的異國生活仍回到台北的廈門街。從那些伴隨他多年的舊地圖中，余光中描寫了自己舊大陸、新大陸和一個島嶼的生命歷程，並刻劃自己所處的時代，一個混亂而又充滿希望的時代。從對頗具抽象美的地圖的品賞和神遊中，終於抑制不住地喊出了“中國啊中國，你全身的痛楚就是我的痛楚，你滿腔的恥辱就是我的恥辱”，^① 一如半個世紀以前，郁達夫在其小說〈沉淪〉中的哀痛呼叫，雖然余氏強調知性，在散文創作總體風格上與五四時期那些浪漫甚至濫情的散文已判然有別，但此種感時憂國之情仍然與其前輩一脈相傳，此類感傷也可以視為其70年代之前大部分散文的主導性情感。在那時寫下的傑出之作，如〈逍遙遊〉、〈登樓賦〉、〈蒲公英的歲月〉、〈伐桂的前夕〉等篇章中，故國

的思戀，文化的孺慕遠遠超出了其中的愛情、親情和友情。^⑬

林耀德也是一個地圖蒐集者，並時常將稿債棄之不顧，把玩品賞他的收藏。他總是力圖超越社會表象，在地圖上思索一些永恒的問題。在他的〈地圖〉中，他想到了人類的戰爭史、宗教史、心靈史……（要讓一篇散文承載如此衆多的大問題不免顯得壅塞和吃力）他在〈地圖〉中，也比較兩岸各自通行的不同版本的中國地圖，那差別正象徵着兩岸關於中國所持有的不同概念，對此怪誕的政治遊戲，林耀德守着一種超然物外的客觀，並不大聲疾呼。

就作者個人經驗的差異而言，大陸對於寫作〈地圖〉時的林耀德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神秘的未知，而不是憂患的回憶或傷口的觸摸，所以，他能較前行代作家更為冷靜地持有一種保持距離的觀照。然而，這裏更重要的原因是創作觀念的差異，追求零度風格與去中心，正是後現代主義的一種寫作策略。在這裏，林耀德有意隱蔽自己的政治激情，他彷彿羞於在作品中凸顯某種大志向大理想，而用一種隨意式游牧式的漫不經心來談論這個歷史被視為嚴肅而重大的話題，淡化它，或者使其中的政治意涵更顯錯綜投射。

這種言談方式同樣見諸於他其它具有政治性內蘊的散文作品中，如〈中國〉和〈海圻艦〉。前者不動聲色地描寫了當今世界上三種不同版本的中國地圖，大陸的、台灣的及在其它國家通行的，各種版本對中國的疆域都有不同的劃分。作者並不直抒己見，只是用各種統計數字冷靜地說明這樣一個事實——“無機物構成的山河大地竟然如同有機物般增減‘肥瘦’。在這個奇妙的世界上，今天的中國仍然如同魔術道具般踟躕在不同的版本中。”後者敘述的是大清帝國唯一的，也是最後的一艘大型巡洋艦的歷史。作者將此極具歷史憂患意味的題材化解為中國缺乏海洋文學的論據，並時時插入“我相信這些情節只是飽含寓言氣息的小說”，“海圻艦的最後一次奇遇，是發生在這篇文字（指〈海圻艦〉一文）中的”等後設語言，有意製造種種歧義，質疑虛構與真實之間的關係。^⑭

有意對某些可以作為政治見解政治情感噴發口的題材作冷處理，即使被稱為“曖昧的戰鬥”也不願再將文學推為改革現實近身肉搏的工具，即使被誤解為“失落的一代”也不肯繼續總在期望與失望的緊張之間掙扎，這種新的言談方式（也是一種新的史觀和政治觀），不僅屬於林耀德，也在黃凡、張大春、林或等新生代作家涉及政治詮釋的文學作品中昭然凸顯，因此，以上的比較，可以作為一個抽樣，驗

證80年代台灣散文中政治意識的另一種折射方式。

從清新到穿透，從溫馨到犀利，從分明的臧否到寬容的笑謔，從嚴峻的記錄到任性的想像，從永恒的單純轉向五花八門的絢爛，文學世界一統天下的打破，呼應着政治文化的多元化。當然，憂國與嘲諷在許多作品中是並存的，因為，它們本來就不必是互斥的。況且，對於真正的文學，趨時或過時並不是那麼重要。

V

散文不比詩歌、小說，常有特定的文學思潮或作家羣體去統攝和涵蓋，它零散而無法如小說承載足夠分量的政治命題和政治內容，它隨意而不比詩歌可以凝練地傳達出政治情感和政治觀念，它的階段性特徵也不如文學批評文學思潮那麼脈絡分明，這給本文的論證帶來了一定的困難。不過，從上面的匆匆巡禮中，我們還是可以隱約看出特定時空中政治文化與文學創作的多重關係。大略說來，80年代台灣政治文化與散文創作的關係可以劃出三個層次：

一、簡單對應的關係。如隨着從戰爭和對峙中應運而生的專制式政治體制的瓦解，戰鬥色彩濃厚的“政治文學”基本消失。又如，隨着作家政治意識的高漲，政治視野的開闊，幾乎大多數作家都不禁深淺不同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台灣政治現實的某個側面，或者說，政治意識在作家人生意識中所佔的比重都隨上述條件而大大增加了。

二、相對平行的互動關係。如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帶來了散文品類的多樣化多向度。政治文化中的台灣化本土化潮流促進了本土文學的持續高漲。這並不奇怪，一種政治上的權力運作，總要力求形塑時代思想。

三、迂迴齟齬的複雜關係。文學創作的演變固然不能完全掙脫政治文化霸權而成爲一種半真空式的美學概念，但文學創作的變化和發展也未必與政治現實的演變亦步亦趨。台灣從80年代中期至今，不僅是一個充滿着掙脫與衝突的政治世代，同時也是一個資訊發達的世代，一個文化商品化的世代，一個兩岸頻繁互動的世代，它們對各個文學羣體的創作心理和表現技巧也都產生着重大的影響。

還要考慮到，作家並不是都願意將自己的政治人格政治意識都明白無遺的呈露在自己的作品中。因此，即使在作家政治熱情空前高漲，政治陰影日漸消退的社會

氛圍中，也不是在每一個作家的創作總量中，政治文學或准政治文學的比重就會增多。

特別能體現文學與政治微妙關係的仍然是新世代作家。無疑，他們仍處於台灣文化霸權的邊緣，但他們反文化霸權的策略與“台灣文學”的倡導者何其不同。可以說，他們是以一種新的文化反對舊的文化體制，而“台灣文學”的倡導者攻擊台灣文化霸權的根本目的是意在政治。或者說，一是爲了建立新的文化典範，一是爲了在舊的文化系統中大丈夫當如是地取而代之。

黃凡曾在給林耀德小說《惡地形》所作的序言中指出，60年代出生的台灣小說家的一個特點是，與前輩作家相比，政治情結減少了許多。我認爲，如果這是指新世代作家較多地摒棄了前兩代政治糾葛中的恩恩怨怨，那並不錯，如果據此認爲是新生代的政治意識與政治熱情比起前代有所淡漠，則未必準確。1990年6月出版的《聯合文學》第68期，東年作了個特別企畫叫“文學家的國是會議”，提出了您的政治理想和最滿意的政治人物兩個問題，共有老、中、青作家共八十位作答。從其中的答問來看，並不是新生代作家就一定對此顯得冷漠或無動於衷，相反，有的還提出相當具體的意見。^⑭

當然，新世代作家的可貴之處（包括他們對政治進步的貢獻）並不在於其具體的政治觀點是否推陳出新，是否具有可行的效益，而在於他們以一種新的言談方式，對歷來奉爲神聖的政治信仰、歷史詮釋甚至民族潛意識，作大膽的嘲諷與質疑，從而以一種新的觀照方式向根深蒂固的文學文化傳統，向一切權威，一切成規，作深層次的顛覆。

想起了一位詩人的幾句獨白：

歷史的暗流之一
是細緻的靈魂和
粗糙靈魂之間的
傾軋

一個從悲觀的知識出發的自我追尋之旅
也許可以發展成民族永恒的盛會？^⑮

註釋：

- ① 梁實秋：〈平山堂記〉、〈記張自忠將軍〉，載《梁實秋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12月初版。
- ② 臺靜農：《龍坡雜文》，台北：洪範書店，1988年出版。
王鼎鈞：《左心房漩渦》，台北：爾雅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
- ③ 舒蕪：〈談《龍坡雜文》〉，載《讀書》，1991年第2期。
- ④ 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台北：稻鄉出版社，1992年出版。
張大春：〈遼寧街116巷〉，載《中國時報》，1991年9月13日。
袁瓊瓊：〈我父親一生的傳奇與事實〉，《聯合報》副刊，1984年3月31日。
- ⑤ 龍應台：〈對歷史的麻木是最危險的病〉，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8年5月。
- ⑥ 楊牧：《方向歸零》，台北：洪範書店，1991年5月，頁12。
- ⑦ 林或：〈我是淘汰郎〉，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88年3月19日。
- ⑧ 林耀德：〈HOTEL〉、〈地圖〉，見《迷宮零件》，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3年3月初版。
- ⑨ 同上。
- ⑩ 劉克襄：〈沙岸〉，載《隨島走天涯》，台北：洪範書店，1984年初版。
- ⑪ 吳晟：《農婦》，台北：洪範書店，1982年版；《店仔頭》，台北：洪範書店，1985年版。
- ⑫ 簡媜：〈漁父〉、蕭蕭：〈父王〉、詹西玉：〈金帛獻千家〉，載《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第5冊、第6冊，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出版。
- ⑬ 參見阿盛：《散文阿盛》，台北：希代，1980年；《阿盛別裁》，台北：希代，1987年；《吃飯族》，台北：希代，1988年；《如歌的行板》，台北：林白，1986年；《春秋麻黃》，台北：林白，1986年；《行過急水溪》，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 ⑭ 余光中：〈地圖〉，載《望鄉的牧神》，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年初版。
- ⑮ 可參見鄭明嫻：〈余光中論〉中“余光中的中國意識”一節，載《現代散文縱橫論》，台北：長安出版社，1986年版，頁107—116。
- ⑯ 林耀德：〈中國〉、〈海圻艦〉，載《迷宮零件》。
- ⑰ 如林耀德、朱天心、鴻鴻皆有具體的意見。
- ⑱ 羅智成：《泥炭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8月初版。

作者任職於廈門大學台灣所文學研究室。